

《海纳百川·藏书博览》

简装书库·政治

（中国政治）

# 民国要闻探秘

# 01

《民国春秋》编辑部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

## 编者的话

民国史通俗刊物《民国春秋》双月刊，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创办于1987年1月，至今年底已历10载，出刊60期，600余万字。虽然本刊在史学期刊中发行量是较高的，但仍有很多读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能订到本刊，或没有能订到前几年的本刊，并以此为憾。而本编辑部又一时出不了《民国春秋》合订本，不能弥补这部分读者的缺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民国春秋 杂志荟萃》，以应众多读者阅读之需。

本刊创办10年来，承读者厚爱，专家、学者扶持，始终保持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在林林总总的期刊激烈竞争中，占有了相当的优势。先是被评为全国历史专业类核心期刊，继之又荣获华东地区首届优秀期刊评比一等奖，1995年夏获江苏省首届优秀期刊评比一等奖。本刊同仁精心组稿，精心编稿，使刊物真实可信，清新生动，贴近社会，贴近读者，始终呈上升趋势，在读者中影响日广。

不但新近出版的《民国春秋》以题材新、史料新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而且数年前刊于《民国春秋》的文章，重读之下，也别有一番情趣。本刊有保存价值、使用价值、研究价值。海内外数十家报刊，包括《人民日报》、《新华文摘》、《文汇报》及台北《传记文学》等，都转载过本刊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过本刊数十篇文章。编写某些民国史书籍，更是须以本刊为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如撰写关于审讯汪伪汉奸的书籍，必得要参考本刊，因本刊有的文章纠正了一些图书的谬误，甚至补正了档案史料中的疏失。

《民国春秋 杂志荟萃》共分四册：《民国要闻探秘》、《民国要人剪影》、《民国要案寻踪》、《民国艺苑风景线》。《民国要闻探秘》，收入角度较小，写法较新、真实再现民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章；《民国要人剪影》，收入生动记叙民国军政、外交等名人一生经历重要侧面或片段的文章；《民国要案寻踪》，收入详细描述民国重大的、轰动一时的、至今人们知之尚少的暗杀事件和诉讼事件的文章；《民国艺苑风景线》，收入深刻反映民国电影界、戏剧界和文化各界名人的风貌、情操、遭遇、成就的文章。4册字数共100多万字，约占《民国春秋》创刊以来所载文章总字数的大约1/5。《民国春秋》10年所刊文章，大体集粹于此编。

读者对本书有何批评、建议，对《民国春秋》有何批评、建议，望随时指陈，不吝指正。

## 民国要闻探秘——《民国春秋》杂志荟萃

## 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最早究竟是由谁透露出来的？仅是怎样透露的？许多史著和文章对此语焉不详。笔者在阅读民国史料时，发掘到有关这一问题的一些史料。现据此谈点一管之见。

1914年的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一些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战，无暇顾及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日本则利用这一形势，趁机加强在华的侵略势头，企图排斥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特务在华活动十分频繁。早在大战爆发前夕，日本参谋本部就已获得情报，得知袁世凯确有做皇帝的念头。所以，这一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很注意加强与袁世凯身边一些人的联系，以了解袁世凯的心态，掌握袁世凯的动静。

1914年8月，离大战爆发不到一个月，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把中国的青岛租借地及其周围地区，

包括胶州湾在内交给日本。德国当时虽然无法采取强硬态度，然而还是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日本遂派军在山东登陆，德军在做了两天的象征性抵抗后投降。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整个德国租借地，控制了胶济铁路，并想进一步全面控制中国政府。

到了1914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在1915年的1月18日，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秘密会见了袁世凯，面交充分暴露日本政府狼子野心的《二十一条》。当日置益陈述完《二十一条》的基本内容后，袁世凯十分吃惊，当时他表情严峻，回答说：“此条款请与外务部会商。”临行，日置益威胁说：“如秘密（指《二十一条》）泄露出去，日本当断然采取行动。”《二十一条》共分五号：第一号是关于山东，第二号是关于满蒙，第三号是关于长江流域，第四号是关于福建省，第五号是关于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中国武器的标准化以及全国警察聘用日本教官等问题。

袁世凯与日使会见后内心是非常不平静的。据顾维钧1960年对胡适的入室弟子唐德刚（美国纽约市大学教授）口述历史时说，袁世凯在与日置益见面后，就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同日本谈判的方针，并让当时的外交总长孙宝琦辞职，再次任命职业外交家陆徵祥为外交总长。之后，袁世凯单独召见了陆徵祥，经过密商后，决定不顾日本的威胁，把《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出去。陆徵祥离开袁世凯的大总统府后，立即找来了顾维钧。顾维钧当时任外务部主事兼英文秘书。顾接受命令后，立即携带《二十一条》文本，秘密送往美国大使馆。陆徵祥的原意是先交给英国的路透社，而顾维钧却首先送往美国大使馆。美国新闻界得到《二十一条》后，如获至宝，立即予以公布。消息传出后，迅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注意，更是

深深地震惊了美国政府，并对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在以后几个月的中日马拉松式谈判过程中，每天下午或第二天，顾维钧都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向英美通报谈判情况。

由此可见，最早向全世界披露日本试图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的是美国，而授意泄露《二十一条》的则是袁世凯本人，陆徵祥参与其事，顾维钧是具体执行者。遗憾的是这其中还有许多细小的情节无从核查清楚，盖其原因是顾维钧所保存的1931年以前的文件，收藏在天

津他的私宅，而其中有关这部分的文件全部丢失。

那么，袁世凯为什么要指示陆徵祥、顾维钧把《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给新闻界呢？

原来这是他的一个计谋。围绕《二十一条》，中日双方举行谈判，袁世凯的策略是尽量拖延。他指示陆徵祥，“要尽可能拖延下去。”而日本方面则想尽快结束谈判，尽快签字订约。为了执行袁世凯的指示，陆徵祥想出了许多办法来拖延谈判。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徵祥则提出每周开一次会，并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他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参加内阁的会议。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中日双方会谈三次。袁世凯之所以采取拖的策略，是为了期待西方列强出面干预。这就是袁世凯要把《二十一条》的消息和内容透露出去的原因。袁世凯的本意是想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借助欧美的力量来牵制日本，以便在复辟帝制问题上少付出一些代价。美国政府在得到《二十一条》的消息后，确也向日本政府施加过压力，美国政府通过日本驻美大使和自己的驻日

大使将美国的立场通告东京日本政府，尽管这样，袁世凯还是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到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袁世凯不甘心放弃做皇帝的念头，结果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于5月9日签订了《二十一条》。这样，不仅袁世凯为国人憎恶和唾骂，而且参与签订《二十一条》的陆徵祥也成为众矢之的。

赵映林

## 张宗祥帮助蔡锷脱险真相

天津《今晚报》于1986年5月16日登载了一篇《关于蔡锷脱险的新解》的文章，首次披露：当年帮助蔡锷摆脱袁世凯羁绊，潜逃出京的历史功臣，是现代著名学者、画家、书法家张宗祥，而非外界历来所传言的小凤仙。嗣后，上海《文汇报》于同年10月4日摘要转载了这篇文章，改题为《帮助蔡锷脱险非小凤仙》；《报刊文摘》亦加以转载。

《新解》依据何在？作者说：最近在浙江省图书馆发现了张宗祥先生所撰《记一幕猴戏》，在其后记中说：“袁世凯要‘追蔡之信’首先是由陈公侠（陈仪）得悉的，由于其他人都参加了进步党会，‘皆袁氏注目’，很难接近蔡锷，唯有张宗祥平时‘不参加任何党会’，无‘政治色彩’，而‘追蔡之信’又事关重大，因而

富有爱国之心的张宗祥毅然决然自动要求担当起去送信给蔡锷的重任。蔡锷乘火车逃离北京，直往天津，也是由张宗祥一手安排，并亲自陪同前往的”。笔者近日有幸翻阅张宗祥手稿《记一幕猴戏》，反复研读，觉得手稿所记与《新解》作者所谈大相径庭。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140\_0006\_1.bmp}

《记一幕猴戏》中提到蔡锷离京赴津、东渡日本之事计有两处。一处为正文第9页第1面：“又数旬而蔡氏易装遁矣。袁氏知蔡遁，命陈仪追之。蔡之同谋者亦与陈至稔，知此事，陈仪又木强，忠于所事，不能说之纵蔡，于是赶陈前后至津，嘱蔡迁寓，俟有船即行，迨陈至津，历访蔡之友人，均不得踪迹，废然以返。”另一处见后记：“予向不参加任何党会，因百里（蒋方震）识松坡（蔡锷），二人皆进步党，往还意气之间当相得。公侠追蔡之信既得，他人皆袁氏注目，予时一冷曹，且无政治色彩，乃自任之，速蔡行外，兼在津市赁一宅。”

将《新解》文字与张老的叙述两相对照，不难看出，《新解》的错误之一是：将后记中“乃自任之，速蔡行外”解为张宗祥在北京给蔡锷送信并安排和陪同蔡锷前往天津。殊不知蔡锷早已“易装遁矣”，而张宗祥“乃自任之，速蔡行外”就是自告奋勇赶至天津，“嘱蔡迁寓，俟有船即行”。据有关史料，蔡锷离京赴津是得到袁世凯批准的，并非秘密行事。当时，蔡锷已患喉症，经日籍医师证明和向袁世凯请假获准，于1915年11月住入天津日本医师开设的共和医院，趁机加紧筹划和布置反袁事项，并经常往返京津之间。所谓张宗祥一手安排和陪同蔡锷

逃离北京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蔡锷最后一次由北京去天津是1915年11月17日，同月19日即离津潜往日本，然后转道赴滇。张宗祥急匆匆赶往天津送信从情理推测，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二、三天里。

“新解”的错误之二是：将袁世凯命陈仪到天津追蔡锷误解为“袁世凯要‘追蔡之信’首先是由陈仪得悉的。”张文说“蔡之同谋者亦与陈至稔”，指的是蒋百里。蒋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早陈仪两年。陈仪受命之后向蒋透露了消息，蒋因陈仪此时固执愚忠，不能说服，转而与张宗祥商量，张宗祥乃自告奋勇接过了任务。袁世凯命陈仪追蔡，而追蔡之信首先由蒋百里得悉，这才是张老自述的原意。

在关系反对帝制斗争成败的关键时刻，蔡锷的同谋者蒋百里为什么想到了一个书生的张宗祥？张宗祥又为什么慨然允诺，甘冒危险充当报警信使？

原来，蒋、张是浙江海宁同乡，又是同庚。1898 年年仅 17 岁的张宗祥就已与蒋百里在切磋学问，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因为两人的友情非同一般，蒋才放心透露机密，张也毅然自告奋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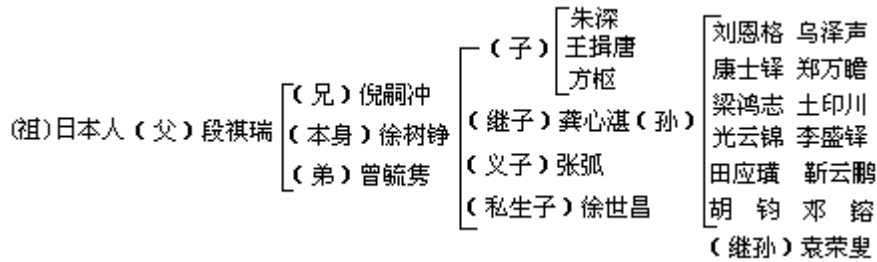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张宗祥对反袁斗争的贡献是，在蔡锷行将转道日本赴滇的前夕，及时报答，挫败了袁世凯最后一次的追蔡阴谋。这就是这段历史的真相。

李性忠

（第 6 页为蔡锷照片）

## 一桩对民国总统的“名誉诽谤”案

1919年9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安福世系表之说明》的“某君戏作”，以诙谐幽默、辛辣嘲讽的笔致揭露了安福系对外卖国，对内独裁的嘴脸，由此引出了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名誉诽谤案”。那么，这篇“戏作”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以致对簿公堂。原来该文将安福系各主要人物加以分类，排成如下世系表：



并加以说明，指出安福系成立后，一味依靠日本人，与之订立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高徐济顺铁路借款合同，肆意出卖国家主权，不言而喻，日本人是安福系的“祖”。该系以段祺瑞为首领，一切行动唯段马首是瞻，而段不亲自出面，显然为“老太爷”，为“父”。徐树铮为段的心腹干将，无论表面上还是事实上皆是“主体人物”，而王揖唐为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代小徐出面组织，精心筹划，充任党魁，“非克家令子而何？”倪嗣冲自始至终协同徐“捣乱”，挟势力吓人，在小徐与靳云鹏争宠失意后又尽力为之排忧解难，自是“贤兄”无疑。曾毓隽主持党务，势力介于徐、王之间，“非弟而何？”朱深长司法部，与小徐关系极深，在其权限范围内处处承顺小徐，方枢前任国务院秘书长，即小徐替身，其为议和代表亦代表小徐，无疑，朱、方“皆佳儿也”。龚心湛原非安系，只因热心作官，投入门下，而安福系除用龚抵挡风浪以外，对他却不很爱惜，“恰合螟蛉子之地位”。张弧新近投入安福系，为安福系收买非法议员数十人，又竭力为王揖唐效劳，自是“新结拜之干儿也”。徐世昌为非法国会选举产生的总统，犹非正式结婚所生之子，“则为私生子亦无疑也”。至于其他人的地位皆在上述诸人之下，而皆有“承家分产之望”，“名之以孙亦宜也”。惟有袁荣叟本为研究系骨干，近投安福系门下，出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则螟蛉孙之得意者”。

这篇“惹祸”的文章发表后，北京政府恼羞成怒，遂委派穆安素律师为代表，向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起诉，指控《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及在职官员”，并票传该报经理邵仲辉（即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二人到庭。10月1日，邵、叶二人延请林百架为辩护律师，自行投案。10月3日，法院开庭，首先由原告律师提出控告理由，接着邵、叶二位被告进行申辩。随后，双方律师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被告律师林百架首先为被告作无罪辩护，陈述了三条理由：（一）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自由言论的权利；（二）原告控案，应由北京当局派员来沪，提出充分证据；（三）原告指控的文词原为游戏性质的政策批评文章，未违反宪法规定，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况且，该文本意是为了促进中国有良好政府，俾中国人民永享和平之福，并无任何侮辱意义。进一步言之，即使法庭认为被告举动越出了宪法规定的自由范围，也不能认为被告有罪。总之，原告实际提出的证据与控告实际依据的法律之间相距甚远，毫无

符合之处，不能视为有效，法庭应将此案注销。

被告律师辩护后，原告穆律师当即起身反驳，称《民国日报》所载之文足以促使社会舆论讥笑“大总统及在职官员”，不但侮辱了他们，而且容易引起民众对他们的轻视。他认为，对此案应从四方面考虑：（一）被侮辱者之地位；（二）侮辱之方法；（三）侮辱时间及方法；（四）侮辱人之地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二位被告身为报馆主笔，皆受过高等教育，明知该文有侮辱性质而不加删裁，仍旧刊用，用心极为险恶。不仅如此，此文一经登载，使得南北和谈双方愈难接近，于中国未来和平前途大有妨碍。总而言之，被告以上海为避地，极尽诽谤、侮辱之能事，贬损政府官员声誉，情节恶劣，无疑应受到法律严惩。

法庭在听取双方辩论后，进行了庭议。迫于安福系的淫威，作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判决，称《民国日报》所载文章本意良好，颇有价值，惟“侮辱大总统”一层属实，案情重大，最终判邵、叶二人各罚洋 100 元。轰动一时的“名誉诽谤案”就这样匆匆结案了。

方平

## 云南一九二〇年“洋人质”事件

1920年初，云南发生过土匪两次掳走“洋人”，借以要挟地方政府，把他们编队组军、甚至“划地保商”的事件，反映出西南边省当时的多个社会面。官、匪双方，斗力斗智。结果“洋人质”或乘机脱逃，或被官方谍报员营救，全部安然脱险，在民国史上留下了发人深思的一页。

### 美国医师夫妇荒山被掳

1919年冬，在藏南开设医院的美国斯德温医师夫妇，到云南省城昆明度假。圣诞节过后，他们转向滇西，打算北上经武定县，渡过金沙江，返回西藏。

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正在扩军备战，妄图向省外扩展势力范围。他在省内拉伕封马、加税增捐，弄得百业凋敝，社会动荡不安。由于集中精力加强军备，对一些三五成群的路劫盗

匪，长期掉以轻心，并未认真设法，加以肃清。而当零星散匪啸聚一起，成了“气候”，就不容易对付了。当时横行滇西、滇中，拥众数千的杨天福匪部，就是那样由小到大、由弱而强，洗村劫寨，不断危害民众的一股。

斯德温知道云南道路不靖的情况，但按当年政府规定，外国人出行，沿途各县都得派武装护送。斯氏过高估计乡团力量，有恃无恐，雇马前行。单他的行李和在滇购买的土特产，就有64驮。

云南交通落后，汽车还没有出现。省内各县间往来，主要依靠步行或骑马。斯德温一行拥有60多匹马，就像来往于省内各地运货的一个马帮！从昆明到禄丰，平安无事。然而，1月3日，从县城远郊大腰站出去不远，在一个荒凉的山坡下，埋伏在两旁的杨部喽啰20余人，一拥而出。禄丰县公署所派乡团8名，看到遇上土匪，当即开枪抵抗。可是寡不敌众，反被土匪打死了1名。

斯德温夫妇和他们携带的大批物品，被匪众连人带马，一起掠走了！

7名团丁逃回禄丰县城，“洋人”被掳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首先引起外国教会神职人员的不安。当地天主教堂神父列文，急电法国驻滇领事馆，要求转请云南督军公署，迅速设法“招安”杨天福，保证斯德温夫妇的生命安全。

在外国领事敦促下，唐继尧指令禄丰县知事，会同列文和地方士绅，设法和杨天福接头。同时，命令主管滇中及周沿地区军事的第三卫戍区，派出步兵第十四团，由设于禄丰的第一剿匪指挥部指挥，跟踪搜索，加强监视，相机出击。

经过地方设法，官方的“招安”要求，终于传达到匪部。这时，斯德温夫妇被掳已将一个月了。

### 接受“招安”的条件

杨天福决没有料到掳来了“洋人”。他就是滇西人，自从1914年脱离军营，投入“绿林”后，岳母、妻子部被关押在县牢内，财产也完全被没收。虽然多次设法营救，都没有成功。他手头而今有了“洋人质”，因而看出营

救家属的一线希望。于是，他吩咐不准瓜分掠来的财物，并要手下头目，妥善照顾斯德温夫妇的生活。

接到要“招安”他的信息后，杨天福开了窍。他既要营救被押家属，也要保全地位和实力。他估计，手里有了政府急于索回的两名“洋人”，政府同样受到牵制，有很大可能会答应他提出的条件。

2月中旬，第一剿匪指挥部收到了杨天福的回信。他首先表明，自己是云南人，“因为宵小倾陷，铤而走险，遭遇时会，聚众至万。长年剽劫，终非了结”（引文照原函直录，下同），因而愿意投诚，“以靖地方”。

杨天福要求，他的部众投诚后，政府必须“按照游击队编制，按月按名发饷”；愿意回乡者发给保护证件，“使众弟兄各得其所，安心度日”；留下编队者和他们携带的武器，仍由他“完全管率，以免分散滋事，并足以备国家缓急之用”；被扣押的家属，被没收的财产，要全部释放和发还。投诚后，听从政府调遣，如不出省，枪弹由他自备，勿须政府拨济，出省“则需政府补充子弹，调换枪只，每次以20只为度，不敢格外苛求”。

信中还提出保证，今后，东至滇东北的东川、昭通，南至阿

迷（开远），西至大理，在这片辽阔的区域内，如果再发生抢案，杨天福愿意负完全责任！

来信提出，双方可以约期在附近米槽天主堂中磋商具体办法。在这段时期内，杨天福担保不再抢劫。同时，政府军队“亦不得包藏诡谋，乘机袭击，以免冲突，贻害地方！”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法国领事必须出面，担保杨天福今后的生命、财产安全。

## 官、匪双方谈判破裂

唐继尧同意双方进行磋商。由管外交的云南交涉署派出一名科长，会同禄丰和邻县罗次两县县知事，到米槽和匪方代表吴营长见了面。

按照杨天福的部署，吴某带领官方代表，到土匪临时驻地，会见了安然无恙的斯德温夫妇。

2月下旬，磋商正式举行。

官方代表的心态并不平衡。认为既然诚心接受“招安”，杨天福为什么还要继续“管率”部众？会谈还没有开始，便罩上了一层阴影。

双方磋商的焦点，始终集中在“洋人质”问题上。政府要求，立即释放斯德温夫妇；匪方则坚持，必须答应他们提出的全部条件，才能放回“洋人”。

双方相持了四五天，出现了僵局。

一直关注此事的美国驻华公使，从北京派参赞德利来到昆明，和地方政府共商妥善办法。唐继尧除要求和杨天福部接头的官绅，“设法劝谕该匪将斯医生送还”外，也命令剿匪指挥

部，以重兵监视米槽，设如不能索回“洋人”，就用武力进行解决。

杨天福认为唐继尧并无“招安”诚意，2月底，乘官军不备，挟持斯德温夫妇，深夜撤离禄丰县境，经由罗次，退到武定去了。

驻军得报后，立即派兵追击。但已为时过晚，追之不及。仅在罗次县境内，把后撤的匪方代表吴营长击毙。

磋商完全破裂了！

武定多的是深山老林，地广人稀，地形比禄丰远为复杂。土匪来去无定，难觅踪迹。

军方一筹莫展，只得会同县公署，派出多名侦探（谍报员当时的通称），化装为普通乡民，四出查访匪踪。武定驻军营长杜国珍，则要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夺回“洋人”。

### 英国牧师被掳 美国医生获救

在和官方的磋商中，杨天福进一步认识到“洋人质”的价值。他对唐继尧政府拒绝接受条件感到恼火。当退入武定县境、途经偏僻的小乡他谷时，把当地基督教堂中的3个英国人，牧师王怀仁（华名）和高心田（华名）夫妇，连同中国教友晏某、何某、马某3人，也一起掳走了。他想利用掠来的5名“洋人质”，胁迫唐继尧就范。

然而，出乎杨天福意外，高心田夫妇非常机灵，当股匪北退到梅子箐地方的时候，看到匪众稀稀拉拉，疏于防备。夫妇俩抓住这个机会，在坡路转弯的地方，冒险往密林中一窜，躲藏起来。匪徒们也竟然没有查觉，等他们过去了很久，高氏夫

妇才走出密林。他们熟悉地理，于是步行来到最近的元谋县城。

元谋驻军正准备把高心田夫妇送回武定，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出于意外的事。

斯德温夫妇也有着落了！侦探查知，他俩被安置在武定远郊、接近元谋县境的他腊乌地方，因远离县城，土匪估计军队难以前来，看守非常松弛。

侦探深夜摸黑，到斯氏夫妇被囚之处，带领他们乘夜出逃。未费一枪一弹，夺回了美国“人质”。在乡团协助下，斯氏夫妇同样被送到元谋，和高心田夫妇会合了。

稍后几天，武定县公署准备了“花红彩轿”，把两对洋人接进了县城。

尽管如此，地方政府却不能安心。杨天福手中，还有着英国牧师王怀仁！由于两对“洋人质”的脱险，形势似乎越来越严重起来。

### 匪首的动态

3月6日下午，杨天福在武定县属麻地梁子地方，得知高心田夫妇中途脱逃到元谋的事，又急又恨。晚间，他组织了四五百名匪众，扬言追捕在逃的“洋人”，攻向元谋县城。驻军即时出动，半路击溃了匪众。

杨天福退回麻地梁子后，严峻的形势使他踌躇起来。最后，把王怀仁唤到身边，自己口授，让他写好两封信。晏某和何某两位教友，作为前往武定的信使而被释放了。

两封信，中文短信写给驻军营长，警告不能派兵追击，否

则“必伤外人”。英文信写给高心田，要求他上报英国驻滇领事，和唐继尧商谈。除同样警告不能派兵追击外，还建议当局，把滇西一带地区，划为杨天福的“保商区域”，准他抽取“厘金”（税款）。“若准所请，由政府指定地点，撤去军队，双方派员会商”。

杨天福接着南撤，被掳去的马姓教徒乘乱逃回。只有王怀仁，被匪众带走了。

## 最后一个“洋人质”出险

官方的侦探继续活动，其中有个名唤贺家运的，在土匪撤退途中，被当做普通乡民，掳去充当力伙，随队同行。

3月9日下午，贺家运在元谋西南的牟定县境内，看到被土匪挟持南行的王怀仁。他们原就相识。于是，扛着一袋粮食的侦探，故意靠近了英国牧师。土匪们都忙着赶路，对王怀仁并不特别留意。然而，前后十来步间，都有着三三五五的匪徒。贺家运只能匆匆告诉王怀仁，要他夜间警觉一些，自己将设法来找他，和他一道逃走。

这一夜，匪众在牟定境内的麦厂留宿。居民们早已跑到附近的山间躲藏起来。土匪挨家搜查，粮食和值钱的衣服都被掠走。他们最后集中到一个打谷场上，利用搜来的大铁锅，垒石成灶，生火煮饭。饭后，到空无一人的民房住宿，王怀仁由三名土匪带着，也住进了民间的平房。

跑路跑得太疲乏，顷刻间，匪众全部沉入梦乡。一直留意“洋人”行踪的贺家运，悄悄地摸黑入门，和早已在等候他的王怀仁会合，一道逃离匪窟，向荒郊跑去。

两个人跑了半夜，碰到了巡夜的团警，贺家运说明情况，要求把他们护送到附近的猴井。次日，得到急报的剿匪指挥部，派兵前来，把王怀仁接到了禄丰。

最后一个“洋人质”出险了，驻军没有了顾虑，对溃匪发动了猛烈攻击。杨天福连连失利，边退边抢，使得滇西的匪情，突然变得严重起来。

杨天福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对策。滇西各县间，山多林深，出现了兵来匪散，兵去匪聚、继续抢劫的局面。到4月中旬，杨天福又忽然出现在禄丰西邻的广通县境，还到他家的祖坟杨家莹地扫了墓。而当步十三团俞营闻讯赶到，他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 余闻：杨天福的覆灭

从5月到8月，杨天福匪部依旧活跃在武定、罗次一带，一度还抢掠了昆明西邻的安宁县郊乡村。但在政府军认真进击下，实力逐日削弱，连参谋长简希贤都被活捉，“解省正法”。

在不利的处境中，杨天福审度形势，终于作出了“无条件投诚”的抉择。9月中旬，他把投诚信送到了禄丰，19日，又派营长毕玉麟到禄丰剿匪指挥部，表明“甘心投诚，永无反侧，并不要求他项条件”。

唐继尧当时正在“废督裁兵”，准备实现“联省自治”的野心。私愿把他无法制服的土匪“招安”过来，为我所用。因而不但同意杨天福的请求，另外还派知情人到滇南，“招安”另一著匪吴学显。

西、南两路土匪，1920年10月初，全部换上官军制服。唐

继尧命令他们集中到昆明，指定南郊干海子营盘为暂住地。同月17日和19日，吴学显和杨天福先后被唐继尧召见，委派他们担任游击队第一、第二支队长。土匪收编的军队，民间统称为“招安军”。在唐继尧庇护下，依然过州吃州，过县吃县，为害乡里。

1921年1月下旬，原驻川滇军军长顾品珍由滇东北起兵“倒唐”，唐继

尧下野出走。2月上旬，顾氏进驻昆明，被推为滇军总司令。对于唐部的师旅长和中下级军官，除少数随唐出走或坚决辞职者外，顾氏一律以“滇总”名义，任命他们担任原职，吴学显和杨天福自不例外。

土匪蹂躏地方多年，民愤极大。为防万一，云南省议会曾作出提案，建议收缴“招安军”的武器。顾品珍当时正在整饬军风纪，也风闻“招安军”纪律松弛，因而把这件事交由新任第三卫戍区司令杨蓁去处理。杨蓁奉令后，作出了“双管齐下”的决定。先由他带领武装，去拘捕吴、杨。得手后，再请第二旅杨池生团协助，到干海子收缴武器。然而，想不到出了内奸，杨团参谋杜宗奇，和吴学显友善，慌忙找到吴学显，把机密泄漏出来。吴学显听到吴总司令要下手，立即到南城外杨宅找到杨天福，邀约杨一起回干海子，把队伍拖到滇南，另谋发展。杨天福迟疑不决，吴学显返身就走，骑马赶回干海子，煽动两个支队一起哗变。在他统率下，连夜逃往滇南。杨蓁没有逮到吴学显，接着出城到杨家，一场枪战过后，杨天福俯首就擒，很快便被枪决了。

吴学显此后继续横行滇南。1922年3月，唐继尧集结驻桂滇军，攻回云南，密令吴学显部里应外合。顾品珍率军阻击唐继尧时，误中匪部埋伏，陷入重围而阵歿。

万揆一

## 孙中山立遗嘱

孙中山先生逝世前曾立有遗嘱。流行的说法是，《遗嘱》及《家事遗嘱》系孙中山本人口授，由汪精卫笔录。然遗嘱产生经过究竟怎样？即使是当时逐日详细报道孙中山病情及治丧情况的《大公报》，对此亦语焉不详。该报载：“中山病状，近五日内日趋危险，昨晨已不能饮食，惟神思尚清楚，嘱进日前所准备遗嘱，手自签字，嘱咐家人，语至数十分钟……”《申报》报道得更简略：“孙中山病势，至昨夜骤恶，急招国民党干部留下遗言。”

近翻阅 1928 年上海广益书店出版的《孙中山丛书》第四集，见有黄昌谷（当年曾跟孙中山同赴北京）写的《中山先生北上与逝世后之详情》，文中有孙中山留立遗嘱的详细经过，现介绍于下，以飨读者。

1924 年 11 月 13 日，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取道日本北上。一路上夜以继日处理公务，加之旅途劳顿，以致 12 月 4 日

至天津后，历年积劳之疾一朝并发。

1925 年 1 月 26 日，孙中山因病久治不愈，进北京协和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遂延请各国名医诊治，并采用西方最先进的镭锭疗法，然终不见效。遂于 2 月 18 日出院，移住铁狮子胡同 5 号行辕，改以中医施治。

至 2 月 24 日，孙中山病情陡恶，随行人员焦急万分。是日下午 3 时，一位女看护对宋庆龄、孙科、汪精卫等人说：“依我的经验看，恐怕孙先生已到了极危险的时候了，你们诸位有什么话要向孙先生请示，现在恐怕已经是到了时候了。”

早在 1 月 26 日确诊孙中山身患不治之症后，随行的家属及国民党要员，均极力主张预备一个遗嘱，万不得已时，请孙中山签一个字，以作全党遵守之信条。今日见孙中山生命垂危，认为此事宜速办，毋容再拖延，便公推汪精卫负责办理。

汪精卫把孙夫人宋庆龄请出病室，征得她同意后，便与孔祥熙等走到病榻前。这时孙中山似睡非睡，听得有人进来，张开眼问道：“你们有什么事呢？”言毕又闭上了眼睛。汪精卫弯下腰，婉转地说：“我们四个人今天是以同志的资格来看总理的病况的，总理的病大概不久就可以好了。不过好了之后，必需长时间的调养。调养期间，本党的事情很多，又是很忙，不能够停滞的，一定要有同志，代总理去执行党务才好。要有同志能够代为执行党务，合乎总理的意思，没有错误，一定要总理先说几句话，让各位同志有所遵守才好呢。”汪精卫讲话时，孙中山听得很认真，他沉静了一会说：“我没有什么话要说啊。”汪精卫再次劝道：“总理的病一定是可以好的，不过在完全没有好之前，恐怕调养的时间太久，不能够理事务，所以还是希望总理早说几句话，让我们能够遵守，照那些话去进行党务才好呢。”

孙中山沉默了许久，睁开眼，神志极为严肃地说：“我看你们是很危险的啊！我如果是死了，敌人是一定要来软化你们的；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敌人一定是要加害于你们的；你们如果要避去敌人的危险，就是一定要被敌人软化，那么我又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汪精卫又用极为诚恳的语调请求说：“我们跟随总理奋斗了几十年，向来都没有怕过危险，以后还怕什么呢？向来没有被敌人软化过，以后还有什么敌人能够软化我们呢？不过总是要总理先告诉我们几句话，令我们有所遵守，方知道怎么样向前去奋斗呢。”

孙中山见汪精卫等恳求再三，缓声问道：“你们要我说话呢？”汪精卫见有了转机，连忙说：“我们现在已预备好了几句话，读给总理听，总理如果是赞成，便请总理签个字，当作总理所说的话。总理如果是不赞成，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话，我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孙中山听到这里，便说：“好呀，你们预备了什么话呢？念给我听吧。”汪精卫便拿出一张纸来，低声朗读：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听完后说：“好呀，我很赞成。”这时又有一位家属（孔祥熙）请求说：“先生对于党务，既是赞成说几句话，对于家

属，可不可以照这个样子，也说几句话呢？”孙中山说：“可以呀，你们要我说话呢？”汪精卫随即又取出一张纸来念道：“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吾志。此嘱！”

汪精卫读完后，孙中山点头说：“好呀，我也很赞成呀。”汪精卫紧接着说：“总理既然是很赞成这两张字，今日可不可以就签一个字，当作总理自己说的话一样呢？”孙中山点头同意：“可以呀！”汪精卫于是开门出病室去拿笔。

这时宋庆龄正坐在客厅里恸哭，见汪精卫开门出来，立时走进病室。孙中山见夫人哭得很伤心，便决定暂不签字，以免去夫人对病人的绝望，所以当汪精卫拿了笔进来时，便说道：“今天不要签字，过几天再看吧。”众人遵命，从病房中鱼贯退出。以后大家因担心引起孙中山及夫人伤感，所以均不再提在遗嘱上签字事。

转眼两个多星期过去了，孙中山的病已到了百药罔效、群医无策的绝境。3月11日上午8时许，何香凝发现他的眼睛已散光，便与汪精卫等商量，准备让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延至正午以后，孙中山挣扎着对榻前伺候的人说：“现在要分别你们了。”随即示意汪精卫近前，吃力地说：“拿前日所预备的那两张字来呀，今日到了签名的时候了。”汪精卫便取出上月24日所写的《遗嘱》及《家事遗嘱》，由宋庆龄托着孙中山的手腕，用钢笔在上面签上“孙文”字样。签字后又用极安静的态度，向家属一一嘱咐后事。次日（3月12日）上午9点30分，缔造中华民国之第一伟人孙中山终于与世长辞。

骆盛 茂倩

## 廖仲恺遇刺轶闻

廖仲恺先生于 1925 年 8 月遇刺于广州国民党中央执会门前，事件发生后举世震惊。当时正值黄埔党军成立之初，广东国民政府准备北伐之际，骤然失去革命中坚和政府台柱，当然是广东革命政府以及全中国革命派的一个大损失。王懋功当时为广州卫戍总司令、黄埔党军教导第二师师长（第一师师长为何应钦）、第一军及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总队长，是处理这一要案的当事人之一。

40 年代初，王懋功被任为江苏省政府主席，但为顾祝同、韩德勤二人所排挤，无法上任，折腾半年，从皖南回到重庆，闲居渝郊老鹰岩游龙山何应钦公馆前院。当时笔者刚好在陆军大学学习，王懋功为笔者长辈，他自称也是陆军大学学生（王曾于 1926 年春赴苏联，系苏联红军伏龙芝大学即苏联红军大学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与笔者为黄埔师生关系。他经常召饮笔者，与笔者无所不谈。

据王懋功谈，刺廖案发生前，他们（王及蒋介石）通过眼线人物已有所闻，据说以胡汉民为中心的右派国民党要人，要对廖仲恺先生采取行动，而廖仲恺先生及何香凝先生对此亦有所闻，故已有所戒备。然而，事出仓猝，廖先生不幸遇难。刺廖集团内部可能也不一致，行刺之事，连胡汉民事前也未有所知，可能并非计划行动，而是出于少数人偶然钻了空子，遂下此毒手。

案发后，胡汉民首先躲避起来。而广州卫戍总部当夜便逮捕了胡汉民之弟、粤军将领胡毅生以及有关的人员。王说，一举抓到胡毅生，也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王在案发后即亲自秘密派遣了得力人员和少数精锐武装，于入夜后即包围了胡毅生宅第，缴了守卫人员的械，胡毅生束手就擒，连手枪也来不及拔出，便做了阶下之囚！在王氏和笔者谈到胡毅生时，虽已事隔 10 余年，但他仍然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而加仑将军等苏联顾问向

孙中山先生建议成立的党军，便是以黄埔军校学生为基干，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掌握的军队。这时，以苏联武器为主装备起来的黄埔党军，已初具眉目，有两个教导师（干部全为黄埔军校教官及学生）以及其他部队，已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番号，蒋以第一军军长进而为北伐军总司令。但是，此时粤军总司令部也并未取消，蒋氏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长，也并未解职。以许为首的旧粤军将领，面对黄埔党军，不免有芒刺在背之感。

据王谈，许崇智志大才疏，优柔寡断，而胡毅生等人则属于困兽派，是铤而走险的首领。但是，行刺之事，胡毅生也未必是事先策划了的，而在当时，王蒋均注目于胡毅生。王说，他之所以给胡毅生来了个措手不及，其原因便在于此。胡毅生这个人反应迟钝，不若其兄之精明，事到临头，依然稀里糊涂，强作镇静，其人不谙谋略，真个好笑之至，宜乎其为阶下囚也矣！

胡毅生在被捕后一口咬定他并未参预刺廖之事，但却透露出许崇智曾“暗示”要把廖除去。理由是，廖掌握财政，是黄埔之母；除掉他，黄埔这个幼儿便没有奶可吃了！

然而，在北伐军总司令部执掌兵符的蒋王二人，当时也无法弄清何人为刺廖凶手，多数人认为是朱卓文，其实也不见得。后来才知道凶手是许部一